

## 陈云： 危难之际撑大局

誓言无声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陈云

虢安仁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革命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危难之际出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率领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在保卫党中央安全和获取情报等方面立下了卓著功绩。

### 危难之际，26岁重建中央特科

1931年4月，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了很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危急。

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被叛变，临时中央机关36名共产党人被捕。危机再次袭来。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继续生存……

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并提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危难之际，年仅26岁的陈云挑起了重担，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中。

如何使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尽快摆脱叛徒带来的打击，迅速开辟中央特科新的工作局面，成为了摆在陈云面前的首要难题。他与潘汉年等同志一起，短时间内从观念、组织、制度、方式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使得党的隐蔽战线迅速打开新局面。

### 精简特科，重点突出政治保卫

顾顺章叛变后，大部分特科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心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斗争，少部分投机分子则偷偷做起了叛变投

敌的密谋。形势十分危急。

“冷静、沉着”的陈云迅速调整思维，他指出，“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中央特科现在的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

在陈云的带领下，中央特科的工作逐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同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陈云调整内部组织，将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再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调离；同时撤销第四科（原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3个科进行精简缩编。

### 单线联系，变化多端

为了汲取顾顺章、向忠发等的教训，陈云要求特科改变原有的活动方式，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间的往来。

如规定“每个人的住所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更换”。他还要求特科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社会关系掩护特科工作。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摧毁了特科历经艰辛搭建的情报网，也让敌人对我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情报工作重建难度加大。在陈云的领导下，特科一方面继续坚持“打进去”和“拉出来”，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重新建立起情报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开创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积极同上海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士广建联系（如董健吾、杨度等），为我党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 “假自首”打入敌人内部

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央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并报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同时决定，如果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而无法掩藏身份的，在不帮助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政策。

事实证明，“假自首”有力瓦解了敌人的自首政策。一方面，开辟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使他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了信任，将其秘密处死。陈云等人还经过秘密策划，对敌人的特务首脑和特科的叛徒进行了公开刺杀，这大大打击了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队伍士气，也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

白、牛兰夫妇的转移和营救等保卫任务。

### 大模大样开铺子做假老板

经过艰辛的重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的中央特科恢复了元气，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顽强与敌人巧妙周旋。这期间，陈云还有一段开铺子做买卖，当“掌柜”的特殊经历。

为了更好地掩护特科，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20多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陈云本人的办事机关隐藏在上海海关路一个名为“新生”的印刷所内。他“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位青年工友（特科人员李士英）和几个学徒，就“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就这样，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地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陈云后来说，他的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则在回忆录中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产党内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茫然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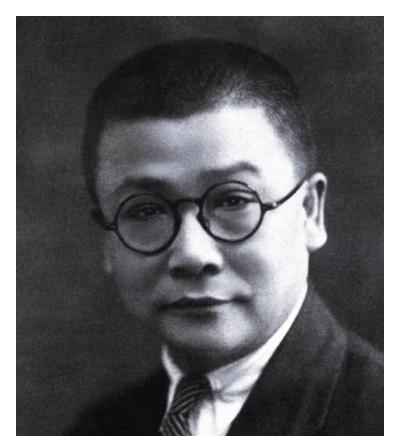
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的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立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显著。”

1932年3月，上海爆发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中央决定让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离开特科领导岗位，陈云开始了领导工运的新的革命历程。

### 主要参考文献：

- [1]杨世保 王吉胜《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
- [2]《“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陈云》中央党史研究室《百年潮》2013(11)
- [3]于美丽《陈云与中央特科》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5(9)
- [4]保密观《追忆陈云：顾顺章叛变后，在上海“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2020年4月10日
- [5]张伊丽《解密：陈云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前前后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年7月20日
- [6]王洪 陈宗良《忠诚与信仰——西柏坡无名英雄丰碑展览人物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李克农： 上将胸中百万兵



李克农

虢安仁

“沉默的军队”，一直为党中央承担着隐蔽战线配合公开战场的职能。

### 从侦察兵到领军人

李克农之所以能出任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人，与他此前成功“潜伏虎穴”和长期建设党的情报队伍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之下，一支“侦察兵”秘密潜伏进入了“作战位置”。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这一决定基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4月25日，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直接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

此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李克农回到中央苏区，在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主要负责肃清间谍、保卫中央，以及大战役后高级军官俘虏的审查处理工作。中央红军组建红军政治保卫局后，他担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后又在红军保卫局改组的红军工作部担任部长。在长征中，李克农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和红军情报队伍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研究最新情报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而对于李克农本人而言，他也完成了从“孤身潜伏”到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情报队伍的“隐蔽长征”。在延安期间，李克农主持了对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接洽工作，通过斯诺等人，成功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声音，为争取国际合作和援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通过王玉、阎又文等情报干部成功对傅作义施加了极大影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渡江战役前，中央情报部更是由李克农领导下，接连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次起义，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又在外事谈判上作出了极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李克农受党中央委派入朝，全权领导对美谈判。李克农利用谈判技巧和多年军事政治情报经验，幕后指挥中朝代表团挫败了美方多个阴谋，达成停战协议，捍卫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

回顾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李克农总结道：“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

### 兵不血刃揽人心

在李克农领导下，我党情报队伍历来重视通过“人心”工作争取各派人士为我党所用。“统一战线”的诞生，就与我党情报队伍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红军胜利会师陕北之际，我党就开始着手争取张学良。李克农为此前俘虏的东北军团高级军官高福源“量身定做”了一部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使其主动向张学良传递中共立场的信息。后李克农亲自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成功敲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关于增强党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针和做法：

### 沉默的军队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情报战略机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参与到了中共情报工作由警报性、保卫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的工作中。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关于增强党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针和做法：

### 十万军情系一纸

欧美几大著名情报机构，以暗杀、色诱、渗透破坏为能，甚至在银幕上极力夸耀自己的特工形象，但我的隐蔽战线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他们有根本的不同。

对于我党隐蔽战线而言，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为我所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同志。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条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中共的优秀党员。

在这张情报网的基础上，李克农领导隐蔽战线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对于我党隐蔽战线而言，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为我所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同志。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条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中共的优秀党员。

主要参考文献：

-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中共党史出版社



陈赓

虢安仁

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政治部的洋探长兰普森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答应。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眼前，还配合他们上演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 陈赓： 旋舞刀尖斗敌顽

锄奸“白心”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院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打牌”的几个人全部押走。白鑫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在麻将桌四周开会的人，分别是彭湃、杨殷、顾顺章、邢士贞、张际春以及白鑫。

陈赓通过“王牌内线”杨登瀛很快查明，出卖党的领导部的叛徒就是“黄皮白心”的白鑫。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企图在中共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的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倒向国民党的投名状，并获得一笔丰厚的奖赏。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决不能让白鑫溜掉。在弄清其具体藏身住址和逃出时间后，中央特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坊周围布下一张大网，数名“红队”队员装扮成补鞋匠和小商贩，守住弄堂到霞飞路的出口。陈赓租住在靠近范公馆的27号3楼，严密监视白鑫的举动。周恩来亲自到现场视察，确定在白鑫翻身那天将其处决的行动计划。

11月11日23点，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终于在和坊43号后门口出现。他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市警察局侦辑科督察员范波及保镖簇拥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码头的汽车。陈赓率领“红队”队员一拥而上，数枪齐发。白鑫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拔枪抵抗，一边夺路逃命。陈赓等人紧跟不舍，终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在71号门牌前。

上海滩界对霞飞路锄奸行动大肆渲染。《申报》称此为“暗杀巨案”，外交报纸使用套红标题《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把枪战描绘得有声有色。上海租界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颤惊。

参考资料：

1. 情报科长“王庸”——陈赓《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 2.“隐蔽战线英雄谱”特别策划《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
3. 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2期



潘汉年

虢安仁

## 潘汉年： 与狼共舞建奇勋

上海，他的使命是获取日伪的情报。

潘汉年的公文包里总放着一瓶汽油与一包火柴。他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随身的一个公文包里，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他就会点燃这些重要情报，防止泄露。

### 暗杀首恶分子王斌

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中央保卫机关决定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鼓舞士气。任务下达之后，潘汉年就开始认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暗杀对象。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府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如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是中央特科决定拿王斌开刀。

不过，今潘汉年大伤脑筋的是，党的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系的任何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汉年看到一条查禁书刊的新闻。细心的他立即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人相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对某些书刊的查禁，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宴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有关人员。

果不其然，张、沈两人不仅认识王斌，还知道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潘汉年又侦查到王斌每天乘坐黄包车从其住宅后门出入。最后，确定将南通法租界、北洋公共租界的龙门路作为暗杀场所，这也是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手持短枪，翻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

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感到极度恐慌，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突然逮捕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两位同志。这次事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将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潘汉年积极参与情报工作。潘汉年能够把我党的抗日情报据点放在日方的情报据点内，这是情报史上的奇迹。